

# 漸放異彩：中國男性史之賡續研究\*

## Slowly Revealed Splendor: Continued Research on Men's Studies from Chine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何宇軒 (Kelvin Yu-hin Ho) \*\*

### 一、前言

當代女性及性別史權威學者曼素恩 (Susan Mann) 曾鄭重提出社會性別作為一種分析角度的重要性，以性別視角切入研究歷史，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歷史。<sup>1</sup>「傳統社會女性為受害者」的觀念於學界已逐漸淡出，以女性作為主要分析對象的性別史研究，相關成果蔚為奇觀。然而，研究性別史必須仔細地考察古代兩性關係及權力分配等議題，例如曼素恩提出在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領域之中，我們應重視「男性氣概」和男性人際關係等議題。<sup>2</sup>若只側重女性研究，而對男性研究有所忽略，委實不足以完全地理解性別關係的特點及發展，故此男性研究與女性研究是相輔相成的。<sup>3</sup>

其實，中國男性史的研究已日漸進入學者的視線。例如在「男性氣概」研究領域內引領風騷的學者如雷金慶 (Kam Louie)、黃衛總 (Martin W. Huang) 均認為「男性氣概」的研究深具發展潛力，可以更細緻地探討從父

權社會所建立的性別規律。「中國屬父系與父權社會」的觀念，於往昔學術界之中根深蒂固。若重新探究男性於父系社會下的性別角色，又會有甚麼嶄新的視角？男性的自我要求是怎樣的？男性群體又如何看待男性性別角色、男性榮譽、男性人際網絡、建立功名等不同議題？然而，目前男性研究的方向已不斷創新，出現更多元化的視野。

審視近期有關中國男性史的研究，男性史研究明顯地逐漸增潤。筆者曾嘗試把相關研究歸納，提出學者的努力集中在男性交友、男性同性戀、男性氣概等幾方面，並以〈方興未艾：學術界的中國男性史研究〉為題，發表研究回顧，探討以上議題的研究成果，亦提出反思及建議。<sup>4</sup>另外，筆者亦曾對中國男性史研究論著進行選輯，撰寫〈中國男性史研究論著目錄〉。<sup>5</sup>由於筆者已發表專文綜述過往的中國男性史研究成果，此處不煩重複。

然而，本文也必須補充提出男性史研究陣容逐漸

\* 本文原為筆者博士論文「明清女性在男性人格建構過程中的角色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17），發表時經過若干刪節。本文得以完成，筆者特感謝劉詠聰老師、黃衛總老師及衣若蘭老師的啟發與指導。

\*\*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語文及傳意學部應用中文組兼職講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

1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0.

2 Susan Mann, "AHR Forum-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5 (2000.12): 1600-1614.

3 周華山，〈誰來界定「男性特質」？〉，《性別越界在中國》（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2000），頁43。

4 見《漢學研究通訊》32: 4 (2013.11): 1-10。

5 見《書目季刊》49: 2 (2015.12): 105-121。

擴大，亦衍生了一些新視野及嘗試，例如男性消費行為（male consumer behavior）及男性形象（male images）等。就前者而言，較具代表性的有巫仁恕的〈士商的休閒消費與男性特質〉一文，後來又收入作者《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一書中。<sup>6</sup> 巫仁恕對男性消費文化的關注，可促使學界反思男性史研究的未來方向，亦需注意古代男性群體行為、消費觀念、日常生活史的探究。至於後者，下文將連同近期的中國男性史研究成果一併作出析論。不過，筆者認為，有關男性對自身性別認知、兩性關係等方面的探究尚待補充。

## 二、社會關係：男性交友 （male friendship）

過往有關男性交友議題的研究，具備不同性質的嘗試，從學者的分析層面而言，包羅了家庭、社會關係，展現了男性交友的階級性及多元視野。從交友的研究時段而言，學人亦較集中於明代男性友道的分析。<sup>7</sup> 誠然，筆者梳理此領域的新著作，發現有關漢晉時期和中唐時期交友的研究亦有所增加。以漢晉時期的交友研究為例，有馬婷婷〈論漢代交友之禮〉、景方方〈漢晉交友詩研究〉、黃昕瑤《魏晉名士的友誼觀：友情與友道研究》等等。馬婷婷注意漢代的交友特色，漢代士人重視名譽與氣節，擇友時重視朋友的才學和品行，而士人結交朋友更需別人的引薦與介紹；<sup>8</sup> 景方方以漢晉士人的交友詩作出分析，藉以闡明漢晉士人筆下如何呈現他們

的交友觀、彼此交流情感的現象；<sup>9</sup> 黃昕瑤則以魏晉名士為主要的探究對象，強調魏晉名士的友誼觀與先秦兩漢友誼觀的相異之處，認為魏晉名士樂於私交，君臣關係轉變為平行關係；又嘗試破除公交與私交之別，友誼觀的發展可涵蓋任何人、自然界的萬物。<sup>10</sup>

至於在中唐時期的交友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有 Anna M. Shields 的《知我者：中唐的友誼與文學文化》（*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Anna M. Shields 指出在一些中唐及晚唐散文寫作中，「知己」一詞既表示親密的朋友關係，亦代表友人了解自己的才華與潛能。<sup>11</sup> 有關友誼的話題亦成為文人筆下不可或缺的寫作題材，例如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互相撰寫唱和詩等；若朋友已逝世，更會書寫作品以悼念已故朋友，例如神道碑、誄、祭文等體裁。作者亦強調了解中古時期男性文人友誼的發展，可有助學人理解宋代以前關於「男性氣概」的歷史脈絡、兩性及男性與同性之間有關性欲議題的論述。<sup>12</sup>

筆者認為以漢晉時期和中唐時期交友的研究作為基礎，與明代的男性交友研究連貫起來，使學人對「男性交友」於中國歷史上的發展有較深入的了解。然而，從男性交友的研究去觀察，筆者發現以不同時期作為切入的研究方法較為普遍，而通論式研究則相對欠缺，或可嘗試從一些專題，例如有關友誼主題的寫作，在文學層面上嘗試綜觀各個朝代有關交友的呈現方式，從而補充男性交友研究的不足。

6 巫仁恕，〈消費與性別：明清士商的休閒購物與男性特質〉，《明清史研究》36 (2011.10): 1-36；亦收入其《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士商的休閒消費與男性特質〉，頁293-342。巫氏《優游坊廂》一書著力探究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閒消費活動，並呈現這些群體活動如何令空間的結構作出改變，箇中也展現出社會關係及權力分配等重要議題的考察。

7 參〈方興未艾：學術界的中國男性史研究〉，頁1-3。

8 馬婷婷，〈論漢代交友之禮〉，《管子學刊》2007.3: 93-97。

9 景方方，「漢晉交友詩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10 黃昕瑤，《魏晉名士的友誼觀：友情與友道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頁212-213。

11 Anna M. Shields, *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95-101.

12 Anna M. Shields, *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 p. 335.

### 三、性取向：男性同性戀 (male homosexuality)

在男性同性戀的研究方面，以性文化的角度探究男性同性戀，並集中探討明清時期的男色風氣的著作，不勝枚舉。<sup>13</sup>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學人試圖以士人與男旦的交往為觀察對象，呈現明清時期的「男色」風氣，闡明清代士人與男旦交往的規模與聲勢的擴大，例如有程宇昂《明清士人與男旦》，強調清代士人品題男旦蔚然成風，男旦亦因而依賴士人。<sup>14</sup> 此研究標誌著不同階層的男性互相交往的深入探討，亦進一步呈現了明清社會上男性同性戀的普遍風氣。除了關注社會階層之間男性同性戀的關係如何建立外，學者亦從法律史的視野著手，注意政府對明清社會上的男子同性性行為所作出的規範，比如有范育菁的「風俗與法律：十七世紀中國的男風與男風論述」。范氏認為清政府在規範男子同性性行為方面，相較明代的律法，在概念上產生了重要的變化。例如男性侵犯同性的案例，於法律條文之中採用了帶有「女性化」的書寫形式來形容被侵犯者，亦折射了當時人們對於「男色」的印象和想法。這種把被侵犯者等同受害女性的法律概念，其表現方式於乾隆年間亦有所加強。<sup>15</sup>

利用文學作品探討「男色」風氣的著作，視野亦推陳出新，採用的史料更加多元化。例如蕭敏如〈戲謔下的規戒——清代男色笑話中的諧謔、規戒與性別心態〉提出以笑話書為探究史料，呈現當中對「男色」作出嘲諷的主題。蓋因笑話書的寫作與流行，展現了權力分布、道德規範、各種社會禁忌及性別意識的相互連繫。作者所採用的笑話書，包括《笑林廣記》、《笑得好》、《笑笑錄》及《增廣笑林廣記》等等，並以僧侶道士、科場

士子、梨園優伶等不同的男性角色展示笑話的社會倫理功能及其諷刺意味。蕭敏如亦強調笑話主要由男性文人參與創作，因此，這些著述中所呈現的男性論述風格尤為明顯。<sup>16</sup>

至於康文慶 (Wenqing Kang) 的《癖：中國男同性關係 (1900-1950)》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另闢蹊徑，運用翻譯的性學寫作、文學作品及小報，藉以考察 20 世紀前期的中國男同性關係。而在語言領域方面，作者亦全面地審視論述男同性關係的詞彙之內在含義，比如有「斷袖癖」、「男寵」、「男色」、「南風」、「男風」、「相公」、「兔子」、「屁精」、「人妖」、「雞姦」等等。<sup>17</sup> 不過，對於康文慶所採用的「癖」字，並作為該書的核心思想，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則持相反的論調。康氏認為「癖」字可視為「中國古代傳統將同性戀病理化的依據」。然而，許氏發現康文慶並未對「癖」字加以溯源，例如「癖」字於中國史籍中的相關記載及其語義的演變。許維賢指出「癖」字原義為「積聚」，他亦列舉《康熙字典》中的解釋：「癖」可解作「對典籍詩詞的習慣偏好」。許氏也申述在明末清初時期「癖」字的論述並不包含「病理化」的意義，如作者以張岱 (1597-1679) 及張潮 (1650-1709) 的看法加以說明。故此，許維賢並不認同康文慶對「癖」字的見解，指出學人需謹慎地考究「癖」的意義轉變及發展，不能強調「癖」字必然與疾病掛鉤。<sup>18</sup>

除了徵引翻譯的性學寫作、小報等史料外，許維賢更擴闊史料的範圍，包羅了 20 世紀初以至 20 世紀末的同性愛譯著、書寫同志主題的作品及相關題材的電影，例如有陳森 (約 1797- 約 1870) 《品花寶鑑》、王韜 (1828-1897) 《艷史叢鈔》、李碧華《霸王別姬》和《北

13 參〈方興未艾：學術界的中國男性史研究〉，頁3-6。

14 程宇昂，《明清士人與男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5 范育菁，「風俗與法律：十七世紀中國的男風與男風論述」（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16 蕭敏如，〈戲謔下的規戒——清代男色笑話中的諧謔、規戒與性別心態〉，《漢學研究》31: 3 (2013.9): 229-260。

17 Wenqing Ka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 Wenqing Kang, *Obsession: 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 1900-1950*, pp. 19-22; 亦參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頁10-13。

京故事》<sup>19</sup>等等。

許氏也鄭重指出「近現代中國男性建構」與「同志書寫」千絲萬縷的關係。針對中國男性史研究的方法論，例如「文」與「武」、「陰」與「陽」、「君子」與「才子」等理論體系，<sup>20</sup>他建議作出「老同志」與「新同志」之對比分析，強調「老同志」愛黨的政治原則、對陽剛特質的推崇、較難接受同性戀的特點，反映「新同志」自由的政治傾向、對陽剛與陰性等不同性別特質的接納、破除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對立局面等特點。<sup>21</sup>從作者的觀點來看，由「豔史」過渡至「性史」代表著「陰性男性建構」轉變為「陽剛男性建構」的過程；「男色」更可視為男子之間在社交上吟詩作樂的媒介，並非片面地只視作疾病。<sup>22</sup>

過往有關男性同性戀的研究成果之中，對於「男色」論述文獻之整輯仍然匱乏。然而，史麻稞（Mark Stevenson）及吳存存所編的新著《帝制中國的同性情慾：資料集》（*Homoeroticism in Imperial China: A Sourcebook*）是尤為珍貴的文獻匯編，收錄由上古時期至清代有關「男色」話題的史料，兼及詩、戲曲、小說等多種文體，<sup>23</sup>委實裨益於學界運用相關文本從而開拓更多可行的探討方向。

#### 四、自我認同：男性氣概（masculinity）

過往以中國歷史、社會及文化為主題分析「男性氣

概」的著作，均從個別時期切入，當中以明清「男性氣概」之探討較為普遍。<sup>24</sup>不過，近來學界已嘗試對歷史上不同時代的「男性氣概」之具體狀況作出連貫的考察，可輔助學人更深入地觀察「男性氣概」於各個時段的轉變。值得關注的有韓獻博的《中國歷史上的男性氣概》（*Masculinities in Chinese History*）、雷金慶所編《演變中的中國男性氣概：由帝制國家的支柱變成全球化時代的男子漢》（*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及黃克武的《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

韓獻博（Bret Hinsch）的《中國歷史上的男性氣概》以通論形式分析自周代（前 1046- 前 256）以迄 20 世紀 90 年代的「男性氣概」之發展，而這些變化主要建基於政治、經濟、社會與宗教各方面的歷史轉變。<sup>25</sup>作者採用多元化的主題帶出個別朝代「男性氣概」的特色，例如漢朝（前 206-220）及唐朝（618-907）皆析論男性名譽之維繫，而宋朝（960-1279）則討論男性文人如何透過文化資本的累積來提升個人地位。至於明朝（1368-1644），韓獻博嘗試觀察邊緣男性如「好漢」所呈現的丈夫氣概；及至晚清與民國時期，他著力於探討軍事式的「男性氣概」等。另外，作者亦指出研究中國「男性氣概」必須思量一些重要的因素，例如男性所建立的人際網絡、經濟與國際環境之轉變如何促使男性反思自身的定位等等。<sup>26</sup>

而雷金慶所編《演變中的中國男性氣概：由帝制國

19 《北京故事》屬網路小說，作者署名「北京同志」，原版《北京故事》請參考網頁：<http://www.shuku.net/novels/beijing/beijing.html>，轉引自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頁253，註〔2〕。

20 有關「文」與「武」、「陰」與「陽」、「君子」與「才子」等理論體系的分析，詳參Kam Louie,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及Geng Song,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 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頁42-43。

22 同上，頁275。

23 Mark Stevenson and Cuncun Wu (eds.), *Homoeroticism in Imperial China: A Sourcebook*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4 參〈方興未艾：學術界的中國男性史研究〉，頁6-10。

25 Bret Hinsch, *Masculin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26 *Ibid.*, pp. 7-10.

家的支柱變成全球化時代的男子漢》一書屬於會議論文集，<sup>27</sup> 當中以帝制晚期及現今的中國為主要分析時期。<sup>28</sup> 以晚期帝制中國為例，各學者帶出了此時期「男性氣概」研究的一些新面貌。作為男性，他們如何從親屬關係之建立去思考男性角色的性別期許？例如黃衛總以沈復（1763-1825）的《浮生六記》為探討對象，分析作為貧士的丈夫於追悼亡妻陳芸（1763-1803）而撰寫的詩作之中，也反映了作者對自身的「男性氣概」作出省思。<sup>29</sup>

而在時局及社會經濟的轉變下，社會上不同身分的男性該怎樣自處？基於明清蓬勃的都市及商業發展，吳存存從晚明小說《龍陽逸史》入手，探討男色平民化的現象，並指出小官（catamites）因應市場的需求從而累積可觀的財富及重新定義他們的性別角色；<sup>30</sup> 而史麻稜則以花譜為主要參考的史料，分析 19 世紀北京文人及商人所呈現的男性氣概，從中顯現了兩者對自身的社會地

位所作出的角力。<sup>31</sup>

至於楊彬彬則考究清代著名官員完顏麟慶（1791-1846）如何於《鴻雪因緣圖記》中以畫像和題記撰寫自我人生中的光榮片段及建構「男性氣概」。楊氏發現麟慶的自我形象書寫，由本來所著重的「文」之男性特質，其後演變為彰顯「武」的軍事才能。誠然，這種文武並重的轉變，除了有助於個人仕途的經營，亦與皇帝的取態、國家發生動亂因而提倡尚武風氣等因素有密切的關係。<sup>32</sup>

不過，此書以匯集會議論文為主，同時會議的籌辦者亦沒有嚴格地作出分析時段的限制，所以編者也強調此論文集並非忽視 20 世紀中國「男性氣概」的觀察，恰巧主辦單位所收集的論文議題於時期上就出現了明確的分野。故此，編者指出這種分類更能突顯帝制晚期及現今中國「男性氣概」發展的相似及差異之處。<sup>33</sup> 然而，此研究不但探討了晚期帝制中國中不同階層的女性，例

27 香港大學文學院及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曾先後舉辦兩次以中國「男性氣概」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其後，主辦者決定徵集相關論文及作出適度篩選，因此編成此書。第一次會議名為“Chinese Masculinities on the Move: Time, Space and Cultures-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並於2013年11月28-30日舉行，由the China-West SRT and the Louis Cha Fund in the Faculty of Art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贊助及香港人文學院作出支援。而第二次會議名為“Translat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Chinese Men in Global Contexts-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於2014年12月12-13日舉行，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及英國國家學術院共同贊助。兩次會議的詳情可參考網頁：<http://arts.hku.hk/page/detail/1054>及<http://www.chinese.hku.hk/main/category/news-events/past-events-2013-14/>。

28 現今中國的「男性氣概」發展超出論文範圍，故此處不作贅述。相關內容詳參“Chinese Masculinity Today,” in Kam Louie (ed.), *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37-243。

29 Martin W. Huang, “The Manhood of a *Pinshi* (Poor Scholar): The Gendered Spaces in *the 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 in Kam Louie (ed.), *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 pp. 34-50.

30 Cuncun Wu, “The Plebification of Male-Love in Late Ming Fiction: *The Forgotten Tales of Longyang*,” in Kam Louie (ed.), *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 pp. 72-89.

31 Mark Stevenson, “Theater and the Text-Spatial Reproduction of Literati and Mercantile Masculin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eijing,” in Kam Louie (ed.), *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 pp. 51-71.

32 Binbin Yang, “Drawings of a Life of ‘Unparalleled Glory’: Ideal Manhood and the Rise of Pictorial Autobiographies in China,” in Kam Louie (ed.), *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 pp. 113-134.

33 Kam Louie, “Introduction,” in Kam Louie (ed.), *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 p. 4。而編者雷金慶亦邀請宋漢理（Harriet Zurndorfer）撰寫專論把中國「男性氣概」過去與現在的發展加以連繫，亦期望對20世紀中國「男性氣概」之發展作出概略的補充。她以中國的一夫多妻制和男性氣概之間的關連作出分析，詳參Harriet Zurndorfer, “Polygamy and Masculinity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in Kam Louie (ed.), *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 pp. 13-33。

如小官、貧士、商人及官員等等，也進一步反思「文」與「武」<sup>34</sup>及「陰」與「陽」等男性研究理論體系的應用，<sup>35</sup>其貢獻確實不容忽視。

至於黃克武《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則探討明朝末年到民國初年之間「男性氣概」的演變。有趣的是，作者通過「幽默」文本的解讀從而考究男性的情緒、慾望、身體與男性氣概之塑造的關連，以期深入分析中國男性的「心態史」。<sup>36</sup>黃氏認為菁英階層的男性是文本的創造者與主要的閱讀者，箇中展現了他們通過這類想像空間嘗試對社會規範加以挑戰。然而，這些文人又不能漠視各種禮教的制約，因而形成個人情慾追求與傳統道德思想之間的一種拉扯，也可一探男性從中所作出的種種掙扎。<sup>37</sup>

依據黃克武的觀點，「男性氣概」的界定，與男性之情慾生活及對女性身體的想像具有緊密的聯繫。男子必須對「色」擁有一定的認知，並重視性能力的增強及性技巧的熟練，亦能夠觸發女性的性高潮。此外，他們筆下的女性都有「花癡化」之傾向，她們雖因禮教束縛而壓制自己的情慾，然而，只要男方作出挑逗，女性也會解放自我及追求性愛的享樂。同時，男性文人也致力於塑造「天下無妒婦的烏托邦」，亦呈現了他們極其厭惡女性嫉妒之表現。<sup>38</sup>

作者也表示明清之後這種情慾表現及身體觀念經歷了轉型，尤其是現代國家的建立與科學知識的進步，都促使相關的管制與保障進一步加強。不過黃氏指出這個演變仍有待深入探討，是次研究只屬初步的嘗試。<sup>39</sup>更

重要的是，黃克武以情色文本來析論「男性氣概」之形成，視角頗為獨到，可以彌補過往主要以儒家典範、訓誡文獻等著述為據之不足。

韓獻博及雷金慶的著作，讓我們對周代至現今中國「男性氣概」之變遷有更宏觀的認識。至於黃克武的著述也嘗試考察「男性氣概」於明清過渡至民初的轉型，然而相關演變的分析則有待深化。黃氏主要討論身體、情慾表現及男子氣概的種種關係，也有學人注意晚清及民國早期的身體及軍事式男性氣概之探索，例如石韜（Nicolas Schillinger）的新著《晚清及民國早期的身體及軍事式男性氣概：治兵之道》（*The Body and Military Masculinit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Art of Governing Soldiers*），即屬一例。

此書探討晚清及民國早期的軍事改革，如何促使身體及「男性氣概」的觀念得以重建（the reconceptualization），而著者主要採用軍事演習指南、軍事規條、士兵及軍校學員所使用的教科書、新聞及期刊、專業軍事期刊等史料作為參考文獻。蓋因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之發生，清朝最終落敗。因此，清政府決定推行軍事革新及參照德國與日本的軍制而建立「新軍」（New Armies）。作者提出，晚清的軍事改革者發現軍官、士兵及普遍男性所出現的問題，主要是他們的身體較為虛弱，又缺乏尚武精神的培養和軍事技能之訓練。於是，這些改革家針對以上的弊病，他們嚴謹地制定養生之法及軍事規則，藉以協助戰士在身心方面皆有強健的表現。

34 Mark Stevenson, "Theater and the Text-Spatial Reproduction of Literati and Mercantile Masculin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eijing," pp. 51-71 及 Binbin Yang, "Drawings of a Life of 'Unparalleled Glory': Ideal Manhood and the Rise of Pictorial Autobiographies in China," pp. 113-134.

35 即如李木蘭（Louise Edwards）以審美角度討論《紅樓夢》中男女角色在衣著及打扮方面所展現的男性特質，繼而重新思考「陰」與「陽」的應用，參 Louise Edwards, "Aestheticizing Masculinity in *Honglou meng*: Clothing, Dress, and Decoration," in Kam Louie (ed.), *Changing Chinese Masculinities: From Imperial Pillars of State to Global Real Men*, pp. 90-112。

36 「幽默」文本係帶有鬥趣及諧謔性質的著述，而且屬「言不褻不笑」，因此與情慾及身體的猥褻話題相關。作者主要採用明清笑話書、俗曲、艷情小說及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等史料作為參考文獻，例如有《笑林廣記》、《笑得好》、《鏡花緣》、《白雪遺音》、《肉蒲團》、《姑妄言》、《浪史》、《空空幻》、《癡婆子傳》、《醉春風》及《申報》等。詳參黃克武，《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頁6-24。

37 同上，頁10。

38 同上，頁460-463。

39 同上，頁464。

身體及「男性氣概」之建立，為本書的核心主題，石韜便以下的看法：在身體方面，從軍男性所接受的軍事操練，務使他們的日常生活更有規律，如改善周遭環境的衛生狀況，令士兵的身體得以保持健康；同時，女性的身體也要維持良好的狀態，期盼孕育健康及強壯的嬰兒，有助於國家培育未來的軍事人才。至於在「男性建構」方面，石韜認為，軍事文化可以塑造士兵及軍官的男子氣概，包括從軍人的外觀及行為兩方面切入。前者著重軍事制服及禮儀之制定，而後者側重於提升從軍者的專業水準、提倡尚武精神及鼓勵他們願意為國家而犧牲。另外，執行軍事變革的領導人物也建議「軍國民教育」，係指政府向人民推廣軍事教育，讓他們可以及早為軍事參與作出準備。最後，作者亦指出這些從軍男性成為了「武」之男性特質的代表人物，並強調軍人對於民國時期的政治及社會帶來重要的影響，甚或於1917年，國內的報章曾出現「中國已成為武人世界」的專題報導。<sup>40</sup>由此看來，晚清及民國時期的軍事文化，讓我們得知當時的革新者所採用的治兵之道，如何帶動身體及男性氣質等概念之建構，而「武」的男性氣概亦逐漸地得到一些社會人士的彰顯及認同。

黃克武的專著主要從性文化及身體史的角度著手，並未仔細探討「文」與「武」的男性特質、男性榮譽等性別議題；石韜也側重於展示「武」的男性特質。然而，Lili Zhou〈中國「男性氣概」的重建（1896-1930）〉（“The Re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China, 1896-1930”）一文，即集中討論由清末過渡至民國期間「中國男性因應國家走向現代化所經歷的性別轉變」，<sup>41</sup>亦具有參考價值，不應忽略。此研究進一步審視中國於1896年至1930年所發生的西方國家殖民擴張事件及當時提倡的中國民族主義、民主化和現代化等概念，如何促使中國男性文人

重新建構「男性氣概」。<sup>42</sup>例如作者提出在1915-1923年間發生的新文化運動，提倡「賽先生」（Mr. Science，即科學）及「德先生」（Mr. Democracy，即民主）的主張。「賽先生」的概念鼓勵中國男性進入實驗室，機器、工具的新發明成為年輕男性的「男性化」象徵，「文」的範疇亦擴展至商業、製造業的技巧。<sup>43</sup>此外，因應民主的概念，菁英文人對儒家所定義的「好兒子」亦有所抨擊，他們認為兒子需要擁有婚姻自主權和經濟獨立的權利；而當時的社會也提倡較為平等的父子關係，夫妻關係的聯繫同時有所增強。<sup>44</sup>

韓獻博、雷金慶、黃克武、石韜及Lili Zhou的新著，與過往的著作配合起來，可讓學界對「男性氣概」於中國歷史上的整體發展有更清晰的理解，尤其是傳統文人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歷程、社會性別概念的重新思考等，使「男性氣概」方面的研究更具連貫性及啟發意義。

## 五、消費文化：男性消費行為 (male consumer behavior)

在男性消費的研究方面，成果則相對缺乏，較具代表性的有巫仁恕的〈士商的休閒消費與男性特質〉。巫氏以性別視角探討明清時期兩性休閒消費的差異，先舉出了明清時期江南婦女在休閒活動上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例如士女聚集、婦女參與廟會活動等；在消費文化方面，服飾消費尤其突出，比如明中葉以後江南婦女由樸素走向華麗的風氣，下層婦女模仿后妃、命婦的打扮，從而提高自己的身分及地位等等。相較之下，作者再從男性的角度去探討其購物行為，並以士商階層為主要的探討對象。巫氏認為明清士大夫所建構的旅遊、消費文化，不但排除了婦女的參與，又對女性休閒消費活

40 參Nicolas Schillinger, *The Body and Military Masculinit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Art of Governing Soldier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6), pp. 3-6、320-326。

41 黃衛總曾嘗試提出一些中國「男性氣概」中可以再深入考究的方向，例如傳統的男性文人轉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他們所體驗的性別轉變及如何調整自我去適應這些時局的變化等。參Martin W. Huang,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203。

42 Lili Zhou,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China, 1896-193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12), pp. 1-2.

43 *Ibid.*, pp. 120-121、146、272.

44 *Ibid.*, pp. 248、264.

動作出批評；在購物類別方面，亦有異於女性的消費行為，例如士大夫喜愛收藏書籍及古玩等藝術文物、明清時期大量的日用類書、商業書也是士商階層休閒購物的必備物品。由此可見，明清時期男性與女性的休閒消費模式，建構了具有特色的消費文化。

然而，筆者認為在「男性氣概」方面的論述深度、完整性，都似較不足，茲作出一些建議：例如作者提到男性交遊是排除了婦女的參與，那這種交遊是否只屬於士商階層？康乃爾（R.W. Connell）一書，曾提出「霸權」、「忽視」等「男性氣概」的概念，<sup>45</sup>那麼不屬於士商階層的男性是否就受到「排斥」？一般男性有沒有參與的權利？這種男性交遊是否存在階級之分？士大夫對女性休閒消費活動作出批評，換個角度去思考，士大夫本身對這些休閒消費活動有何評價？男性著述如訓誡文獻、文集之類，對這種獨有的男性休閒消費活動有何反映？有關消費形態是否代代相傳，藉以維持家族名聲？倒過來說，女性對士商的休閒消費有否評論？筆者認為可作延伸探討，從而更深入地分析士商的休閒消費與「男性氣概」的關係。

再者，巫氏又指出士大夫喜愛收藏書籍、古玩、日用類書、商業書等物品，然而作者未能進一步分析這些物品的收藏，與「男性氣概」的箇中關係。士商階層收藏這些物品，是否可以突顯「男性榮譽」？在男性群體之中，彼此交流這些物品的收藏，是否有益於「男性交友」及男性人際關係？但是，作者並沒有進一步分析這些男性購物的行為與「男性氣概」的關係，除了士商階層，其他階層、其他地區男性有否類似的行為？若果有，他們呈現的「男性氣概」有何分別？另外，巫氏又提出士大夫對女性休閒消費活動作出批評，認為家中婦女的消費行為，是敗家的主因，與此同時，他們又喜愛收藏這些物品，到底有否雙重道德標準？筆者認為可以

更仔細地作出分析。<sup>46</sup>

整體而言，巫仁恕另闢蹊徑，以「空間變遷」、「消費文化」的結合為研究方向，為學界的中國城市史研究、消費史及空間史研究帶來新思考及深化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此研究亦注意到兩性消費行為的差異，而男性消費文化的專門探討更有助了解古代男性群體行為及消費觀念，更值得學界反思「男性氣概」在中國性別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 六、文學形象塑造：男性形象 (male images)

至於文學作品所塑造的男性形象研究，成果逐漸增加，就其研究方式而言，個別文學作品所呈現的形象研究，如《詩經》、《聊齋志異》等等，有劉洋〈論《聊齋志異》男性人物形象〉、譚莊蘭《《詩經》男性人物形象研究》、賢娟〈從《詩經》看先秦時代的男性形象〉等等。<sup>47</sup>有趣的是，論者透過《詩經》切入來分析男性形象之塑造，就發現《詩經》的內容並不是單純地描寫男性人物的外貌，箇中也呈現著者如何建構這些男性的「思想、情感、儀態、行為及人格特質」。譚莊蘭更指出周代男性的服飾設計主要以「美服襯托其德」，所以，男子形象是否能與其身分和品德相襯，當時的男性是非常重視的。<sup>48</sup>

而以不同時期的文學體裁為據對男性形象進行探究，論者所採用的文體亦頗為豐富，例如有南朝樂府民歌、唐代婚戀小說、宋話本小說、明清彈詞小說和五四時期女性小說等，例如有王穎〈南朝樂府民歌中的男性形象探析〉、王衛〈唐婚戀傳奇中的男性形象研究〉、王雪晨〈唐前婚戀小說中的男性形象研究〉、尹楚兵〈宋話本愛情婚戀題材小說中男性形象探析〉、趙愛華〈論

45 R.W.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67-86.

46 參拙書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中國史研究》（大邱）88（2014.2）：273-278。

47 劉洋，「論《聊齋志異》男性人物形象」（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譚莊蘭，《《詩經》男性人物形象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賢娟，〈從《詩經》看先秦時代的男性形象〉，《青年文學家》2013.10：8-9。

48 譚莊蘭，《《詩經》男性人物形象研究》，頁294-296。

明清彈詞小說中的男性弱化現象》、廖冰凌《尋覓「新男性」：論五四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書寫》等等。<sup>49</sup> 值得注意的是，學者不單採用男性文人撰寫的文本，亦注意女作家對男性形象的塑造，比如對宋代女性詞作及五四時期女作家小說進行考察等等，有盧蘭〈宋代女性詞作中的男性形象研究〉、廖冰凌《尋覓「新男性」：論五四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書寫》、張毅〈從五四到抗戰：中國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葉一慧〈二十世紀上海女作家小說中男性形象轉變之探討——以六位女作家為例〉、伍倩〈論五四女作家小說中的男性形象〉等。<sup>50</sup>

值得關注的是，學人以「五四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書寫」作為研究主旨，藉著五四時期女性對男性形象的寫作，從而帶出「女性並非只關注自身的社會規範，她們也對男性的理解、認識有所期許與要求」之反思。女性視角不但「表現其現代性、開放性及獨立性」，也讓我們對「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氛圍裡」的兩性期望，具有更透徹的了解。她又表明「新男性」的討論是多元的，不只限制於「國家民族及歷史政治意義上的男性」。作者進一步審視五四時期男性的個人心理、家庭婚姻、工作事業、兩性關係及性別角色與權力等議題。不難發現，男性的性別期許的確包含了女性的聲音，我們不應有所忽略及只偏重於男性立場的探討。女性的看法有助於我們了解男性的性別角色，具備深層的意义。

義。<sup>51</sup>

綜觀男性形象的研究，筆者也注意到學者已關注中國文化及文學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多變，除了剛強男子的塑造，亦注意男作家筆下「文弱」、「柔弱化」及「怯懦」的男性形象，例如有楊雨〈中國男性文人氣質柔化的社會心理淵源及其文學表現〉、林如敏〈明清小說男性形象弱化現象研究〉、李艷麗〈「美男」の誘惑——清末寫情小説の「文弱」な男性像についての解説〉、何宣儀〈唐人小説男性怯懦形象書寫研究〉、趙愛華〈論明清彈詞小説中的男性弱化現象〉等。<sup>52</sup> 不過，在男性形象的研究領域上，仍有補充的空間，例如男女作者所構建的男性形象之比較，相關研究仍然不足，尚待補充。

## 七、總 結

綜觀以上中國男性史研究，除了成果漸豐的三個類別，分別是男性交友（male friendship）、男性同性戀（male homosexuality）與男性氣概（masculinity）外，不難發現，男性史的研究亦出現了新視野及嘗試，例如男性消費行為（male consumer behavior）及男性形象（male images）等等。至於前三者的研究成果，我們更可察見各個類別的相互關係之分析，例如同性戀題材的書寫與塑造「男性氣概」的連繫（如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等）、歷史

49 尹楚兵，〈宋話本愛情婚戀題材小說中男性形象探析〉，《江南大學學報（人社版）》4（2004.8）：82-85、89；廖冰凌，《尋覓「新男性」：論五四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書寫》（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王衛，「唐婚戀傳奇中的男性形象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王雪晨，「唐前婚戀小説中的男性形象研究」（延吉：延邊大學碩士論文，2011）；趙愛華，〈論明清彈詞小説中的男性弱化現象〉，《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社版）》2013.4：75-79；王穎，〈南朝樂府民歌中的男性形象探析〉，《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4：63-67。

50 廖冰凌，《尋覓「新男性」：論五四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書寫》；張毅，「從五四到抗戰：中國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葉一慧，「二十世紀上海女作家小說中男性形象轉變之探討——以六位女作家為例」（新北市：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伍倩，「論五四女作家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盧蘭，「宋代女性詞作中的男性形象研究」（贛州：贛南師範學院碩士論文，2013）。

51 廖冰凌，《尋覓「新男性」：論五四女性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書寫》，頁13、17、240。

52 楊雨，〈中國男性文人氣質柔化的社會心理淵源及其文學表現〉，《文史哲》2004.2：107-112；林如敏，「明清小說男性形象弱化現象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5）；李艷麗，〈「美男」の誘惑——清末寫情小説の「文弱」な男性像についての解説〉，《アジア地域文化研究》6（2009）：81-96；何宣儀，「唐人小説男性怯懦形象書寫研究」（宜蘭：佛光大學碩士論文，2012）；趙愛華，〈論明清彈詞小説中的男性弱化現象〉，《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社版）》2013.4：75-79。

上男性友誼與男性之間的愛情同時發生的探討（如魏囑安〔G. Vitiello〕《浪子的朋友：中華帝國晚期的同性戀及男性氣概》〔*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up>53</sup>等等。誠然，男性消費行為也可從男性交友及男性氣概等角度著手進行思考和探究，男性形象亦牽涉男性氣質的探討。筆者相信將來的中國男性史研究，各個部分的相互聯繫之析論會更加豐富，它們既是男性史研究的重要範疇，也會成為相關研究領域開拓的分析工具及視角。

此外，上述的分析主題也呈現了學界對參考文獻的反思。例如黃克武嘗試採用情色文本來探究「男性氣概」，以期帶出男性「心態史」之重要考察；而巫仁恕

及楊彬彬也結合文字與圖像去闡析男性消費行為及男性特質等課題，促使學人思考如何運用不同性質的文獻來擴闊男性學的分析面向。過往的中國男性史研究較多採用以男性視野書寫的著述，其實，女性作家筆下對傳統男性人格實多所演繹，我們應該加以探索，<sup>54</sup>審視兩性如何共同參與「男性建構」。

總括而言，中國男性史的研究成果，的確漸放異彩。學者曾言古代女性著作之考究「已發展成一片天地，形勢大好」，<sup>55</sup>借用胡氏的說法，筆者亦期望中國男性史的探討方向能繼續開拓，並「發展成一片天地」，對於學界全面地觀察中國性別史和「男性氣概」的歷史發展也有莫大的裨益。

53 G. Vitiello, *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54 例如雷金慶 (Kam Louie) 曾以五四前後女作家為分析對象，析論當時女性筆下如何塑造「男性氣概」，是極具開拓性的探索。詳參Kam Louie, "Women's Voices: The Ideal 'Woman's M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pp. 98-118. 誠然，明清女性作品的探究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一眾學者亦頗為致力於呈現明清女性作家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 及能動性 (agency)。因此，筆者有這樣的思考：若果五四時期女性筆下曾演繹「男性氣概」，那麼明清時期數量極其豐富的女性著作之中，是否又包含著對傳統男性人格的討論？她們對男性性別角色有何看法？她們的作品中又如何塑造不同的男性形象？然而，此等書寫並未普遍為學者所注意，前人從女性著作切入來看男性人格的研究仍然相當缺乏。筆者認為，以女性文本來探究她們對男性人格的看法，對於我們理解明清的兩性關係將有極大的啟發性。

55 胡曉真，〈藝文生命與身體政治：清代婦女文學史研究趨勢與展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3 (2005.12): 28。

## 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

- ※ 本中心獎助國外大學和學術機構之外籍漢學研究學者來臺研究
- ※ 提供經濟艙直飛來回機票乙張及每月研究補助費
 

教授級	NT\$60,000	副教授級	NT\$50,000
助教授級	NT\$40,000	博士候選人	NT\$40,000
- ※ 提供在臺獎助期間意外傷害保險新臺幣一百萬元（附加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 ※ 研究期限：一個月至一年
- ※ 申請文件：1. 申請表 2. 簡歷表（含著作目錄） 3. 研究計畫 4. 推薦函至少一封
- ※ 截止日期：每年5月31日（申請隔年1至12月來臺研究）
- ※ 如欲了解詳情，請洽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或上網查詢申請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電話：886-2-23147321 傳真：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ncl.edu.tw http://ccs.ncl.edu.tw